

美国与中国

[美] 费正清 著

孙瑞芹 陈泽宪 译

商务印书馆

美国与中国

[美] 费正清 著

孙瑞芹 陈泽宪 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
商 务 印 书 馆

1971年·北京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58

内部读物

美国与中国

[美] 费正清著

孙瑞芹 陈泽宪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255

1971年9月初版 197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9) 1.50元

出版说明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各个阶级的人们,都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在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美国与中国》就是适应美国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需要,专门研究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著作之一。本书作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曾于1931年来我国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先后任重庆美国大使馆特别助理和新闻处主任,现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并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作者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哀叹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美国的一次惨重失败,千方百计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泡制新的侵略方案。作者主张从“历史的深度”来研究中国,用“新的方法”来对付中国。所谓“历史的深度”,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歪曲我国的历史,诬蔑我国的革命,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谓“新的方法”,就是从政治、思想、经济、技术等方面向我国渗透,梦想恢复美帝国主义已经失去的势力。作者还吹嘘“对大陆的现实主义”和“对台湾的现实主义”,鼓吹“一中一台”,叫嚷台湾“独立”,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效劳。

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研究中国和中美关系的情况,现在把《美国与中国》一书翻译出版,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

1971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我们的中国问题	1
第二章 中国景况	17
一、南北对照 二、文化源流 三、人与自然的协调	
第三章 中国社会的性质	28
一、社会结构 二、绅士阶级 三、中国的文字——儒生 四、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商人 五、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社会	
第四章 儒家典范	52
一、儒家原则 二、经学正统 三、科学的不发达	
第五章 异族统治与朝代循环	67
一、游牧人的征服 二、最初的中外帝国 三、满洲人的成就 四、朝代循环	
第六章 政治传统	86
一、官僚政治 二、法律 三、宗教 四、中国的人文主义	
第七章 西方的冲击	105
一、欧洲的扩张对中国的扩张 二、中国对欧洲的冲击 三、朝贡制度 四、条约制度 五、人口统计之谜	
第八章 革命的过程：反叛与中兴	127
一、以白莲教为嚆矢 二、太平天国 三、儒家政府的恢复	
第九章 革命的过程：改良与革命	140
一、自强运动 二、基督教、帝国主义与 1898 年的改良派 三、孙中山与中华民国	
第十章 国民党的兴起	160
一、五四运动 二、国民革命 三、南京政府	

第十一章 国民党统治下的独裁主义和自由主义	180
一、中央权力的扩张 二、儒家思想的反响 三、自由主义与教育	
第十二章 国民政府与经济	202
一、经济变化的开端 二、国民党的财政政策 三、道义威信の丧失	
第十三章 共产党的兴起	221
一、共产国际失败的十年 二、毛泽东的兴起与延安时期 三、战争时期意识形态的发展	
第十四章 我们的传统对华政策	242
一、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二、门户开放原则的演进	
第十五章 美国政策与国民党的崩溃	260
一、美援与调处 二、国民政府的瓦解 三、中国的垮台在美国的反应 四、我们的盟友台湾	
第十六章 共产党中国	278
一、政治控制 二、经济建设 三、社会改组 四、思想改造 五、集体化与工业的成长 六、意识形态与历史	
第十七章 对中国和美国的瞻望	308
一、从中国的过去看中国的今日 二、从我们对华政策的失败看我们的对华政策	
文献选读	323
索引	357

第一章 我們的中國問題

1

十年前着手写本书第一版的时候，美国人已经在他们的对华关系中面临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灾难。到了1948年，国民政府无论在战争或政治方面，都无力抵御中国共产党，这已大白于天下。灾难接着就来了。1950年，共产党建立了对大陆的统治之后，八年以来一直努力按照极权的苏维埃形象来改造中国。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他们把美国当作主要敌人，在朝鲜与我们作战，用精心编造的谎言诬蔑我们，虐待美国俘虏，并且总想把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变为仇恨。

美国人对于这场灾难的反应，以一个民族而论，我们是不光彩的。在共产党的攻击下，我们在总的方面表现出自己在感情上既欠成熟，政治上也不够机警。我们尽管有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事实证明，我们仍然是心理上很保守的人，在一个变动激烈的时代里自居满足。我们想以慷慨运用我们的物质资源——武器、经济援助、技术——来应付亚洲革命的广泛的挑战，而没有从思想上作真正的努力，去理解亚洲人民中间正在发生些什么。

我们在逃避这个精神方面的努力时，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归咎于克里姆林宫的阴谋，归咎于华盛顿的错误政策，归咎于我们自己中间的奸细，甚至于像某些人所特别强调的那样，归咎于教授们的捣鬼。我们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现实生活中由于共产党接管而发生的冷酷事实。自从那场灾难以来的我们对华政策，拘泥于狭隘的恪守信义，以国内的政党政治为护符，并不比我们最初的反²应更具有创造性。

我们和我们的西方盟友，在全人类中已经在人数上居于少数。我们面对着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丧失优势的可能性。这场最后灾难的危险，现在正唤醒我们来认真从事研究。

我使用“灾难”这个字眼，是因为革命的亚洲新世界，不论共产主义的或非共产主义的，都不能具有完全与我们西方相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念，特别是我们对于个人在法律下所享自由的关怀，以及通过团体和个人在一个多元的复合社会里对于这种关怀的表现方式。特别是在中国，就我们预见得到的未来而论，一个低于我们的政治生活标准，想必会有一个较低的经济标准随之而来。因此，中美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加上人口对资源比例上的差异，势将使我们渺无限期地分道扬镳。

我认为，我们的唯一出路是客观地去理解我们的窘境，而不是主观地去抗拒它，实事求是地努力成为一个社会科学家的国家，这些科学家要具有一种超越于我们感情之外的眼界，从而把政治上的灾难和孤芳自赏转化为力量的基础，并和一切能和我们合作的人携起手来。

这样，就需要在一种分别对待的基础上，对革命的中国毅然作一番评价，要发掘事实真象（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在历史和环境的脉络中去评价事实，而不是仅仅按照我们自己一家一国的标准行事，可赞者赞，能容者容，必须谴责者谴责。只有无知才会使我们相信共产党中国一切全是“好的”，或者一切全是“坏的”。只有真正的慧眼才能使我们在共产党中国的雄伟的新民族主义之前，保护我们的正当利益。这种民族主义的嚣张和肆无忌惮并不亚于共产党在别处所玩弄的民族主义。

除非我们自己有切实的意见，能够说出为了解决中国人民的生计和政治态度问题，正在作些什么和能够作些什么，我们就很难

用中肯的语言来批评北京。事实是，美国人在1949年以前对于中国问题并没有适当的解决办法，而且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也许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适当的”解决办法。尽管如此，大地正在日形缩小，人口正在日见繁殖，恐怕不久我们就需要和十亿中国人³共处。我们有不少事是非考虑不可的。

不幸的是，冷战的极端思想使得我们只从自己所害怕的那一方面去考虑。这样做并不会挽救我们，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也不会挽救我们的思想自由的制度。我个人像一般美国人一样，对于共产主义同样抱着反感，但是我认为不应当容许感情左右国家的政策或个人的判断。可是对于所有的外交官员、新闻记者和学者说来，他们为美国公众写文章谈论共产党中国，极端的反共论点一直被认为是最稳妥的办法，正像北京方面的极端反美思想一样。这固然是立足于悬崖的边缘，而有些人却用虚幻的、形式上的相对论企图在两个阵营之间恰居中间地位，又何尝不是在漩涡里行舟；例如把中国的强迫劳动与美国的种族隔离等量齐观，而不知前者是个日见加剧的祸害，后者是个日渐缓和的问题。我个人所能够提出的唯一指导路线，是想办法从历史背景中看待中共次大陆的事实，而抛弃我们可能非常喜爱的空泛的概念。

对于中国人民的过去经历和最近的革命，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明晰扼要的看法。本书在探求这种看法时，无法避免广泛的概念，相反，每一页都有。然而，我们在盲人国用一只眼睛工作的人们，不能斯文地抱怨自己的近视，所以处理一个头绪纷繁的题目而挂一漏万，我也不引以为憾了。

可是，为本书增订版进行改写的时候，我曾参考近十年来出版的研究现代中国的专著。可惜我对几十位作者受惠之多，无法一一述明。附录“文献选读”所列一些人的著作，已见于正文。在这

里，我首先向哈佛大学的同事和同学们志谢，因为我从学者们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得到了激励。

十年来“我们的中国问题” 本书于1948年冷战初期，为了明确我们的对华政策问题，开始就指出：“中国……根本上……是一个既不同于俄国又不同于美国的社会，是按照它自己的传统和环境而发展的。美国人所犯的最大错误是，眼睛望着中国而只想到俄国的扩张。如果我们在对付中国时，让自己为我们的权力政治⁴所蒙蔽，我们的政策就会在那里遭到惨败。”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和局部地区研究专家，我曾经指出：“中国有它自己的生命……中华民族是现代世界上最古老的社团。他们的根基至少可以连绵不断地回溯到少则三千年以前，多则将近四千年以前。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伦理观念，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都比我们的具有更大的连续性，而在地理上始终集中在一个地区，并且数千年以来保持住他们自己的惯性，这方面也是我们所没有的。不可能想像，现代中国这一人类中最大而又最古老的人群，可以纳入任何外国强国（例如俄国、美国或者其它强国）的轨道之内，除非中国自己内部发展的本身导致这样一种转向。

“从长远看，苏联和美国只有在了解中国社会变革的潮流，并与它们一致行动之后，才能对中国事务施加主要的影响。像那些叫嚷得最凶的美国人中间某些人正在做着的那样，主观地去对待中国，企图为了美国的目的来利用中国，认定凡是对于我们好的，对于中国人民也毫无疑问是好的，无视中国的舆论，凡是在权力政治上肯与我们站在一边的人便接受为我们在中国的盟友，把中国只看作是一个工具而不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这种思想方法是极其不道德的。而且不论是否合乎道德，它都会导致我们在亚洲遭受失败。”

至于说到 1958 年，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成败尚未可知。过去十年中，我们已经学会怎样在一定限度内协助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我们对于南朝鲜、南越、台湾以及其它地区的援助纪录，尽管还远不完善，已经给人以深刻印象，特别在物质援助方面。只有在应付中国大陆——在那里我们是被官方惧怕和仇恨的——的大问题中，我们仍旧在感情上扞格不入，我们的政策缺乏创造性。我们仍旧是眼睛朝着中国而只见到共产主义。

我们的中国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它牵涉到我们的感情。面对着我们的事实是，占全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接受了某种程度的政治上的独裁主义，而这是我们所不肯接受的。民族主义和工业化的孳生革命正在创造一个强大的中国国家，但 5 是按我们所能接受的民主一词而论，它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在新中国和在旧中国一样，对个人在社会中的估价，和个人在他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中的估价，都与在美国的不同。我们尽可以争辩说，我们对于个人的估价和我们保护个人的制度比人家的好，但是我们不能证明，我们的主张怎样能在中国人生活的拥挤环境中终于得到实现。

为了处理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差别，我们需要从历史上作一番了解，看它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我们需要知道他们的思想行动的主要方式和政治经济的主要形式，这些都是中国的悠久历史所深深渗透到中国社会里的。我们还须看到它们与当前中国局势的关系。没有对于这些传统的了解，没有懂得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和维系着它们，我看美国人没有办法了解现代中国。没有这种了解而径自行动是自寻灾难。

更广泛地看，我们在中国的问题只是我们在整个亚洲问题中的第一线。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推展一种新的理解，发展对于

现在正在亚洲农民群众中起着作用的革命过程的新政策。占人类人口半数的亚洲人正进入一个变革的时代，它是由西方促成的，却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在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危机和它的解决办法（关于人口增殖和食粮供应，关于生活标准和民主程序，关于工业化和民族沙文主义，关于个人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在整个亚洲都像是共同具有的，大同小异的。本书关于中国的论述，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印度。

共产党成功的一个秘诀 正确看来，在1900年以后半个世纪里，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在它之前的历届政权所办不到的一定形式的现代化。1901年以后的清朝，1911年革命后年轻的中华民国，1927年至1937年十年间南京政府时代的国民党，甚至于日本人在他们的八年傀儡统治期间，都曾企图在某种程度上把中国局势中现代化的先天潜在因素变为现实。虽然潜在因素在不断地增长着，但他们终于全都失败了。

6 为了把这一点弄得更具体，我曾于1948年提醒人们注意，直到当时为止中国所做到的现代化是如何的极其肤浅：

“我们美国人所曾经接触到的现代中国只是一层薄薄的表面装饰，轻轻蒙在一个古老文明的外部。在它的底层，旧中国仍然在半个大陆的农村里持续存在着。但是由于语言、物质水平和社会禁忌等等的隔阂，它和我们隔绝不通。美国人与这个古老文明的大量残余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接触。我们关于它的知识，必须以现代中国为媒介，这个现代中国包括受过教育的人们，铁道航空交通线、使用现代语言的书报、从西方吸收去的新观念和新趣味、现代国家的技术和需要等等。在中国现代生活的大杂烩中，财政家、学生、城市无产者、人力车夫（一种新的职业）、受过训练的士兵，都是新社会的构成者，在中国土地上代表着以识字、电讯交通、世界市

场、群众运动等为标志的新世界文化，那也是与我们紧密联接在一起的。但是在这个新中国(它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相互渗透)的底层和它的后面，还隐藏着一个扎根在另一种古老文化传统的古老中国社会。正是这个古老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是我们西方人，也往往是现代中国人所不能了解的。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关键。

“我们所以不能够了解中国，部分由于我们错误地把中国的现代化装饰当作了中国生活的全部。这是特别容易如此的，因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上层阶层——有钱的、做官的和有知识的各阶级——今日差不多垄断了中国的权力机关。政府、金融机构、教育和报纸、官吏都为这新的一代所支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懂得英文，能够轻松圆滑地用西方的方式处理中国的对外问题……”

“过去三十年中，新派的中国学者、商人和官吏，为了在中国古老社会的废墟上建立现代国家而应用了外国的管理技术——财政的、军事的和意识形态的——曾经使人易于被蒙蔽。可是，这个新国家是怎样的肤浅，可以从几个统计数字上看出来。在公路的里数上，中国(1943年：78,850英里)大约与西班牙相等(1941年：77,574英里)。在铁路里数上，中国(1942年：12,036英里，包括东北在内)比美国的伊利诺斯州(12,967英里)或意大利(14,384英里)还少。以后又经过战争岁月和内战的破坏，它的铁路路轨如今要比西班牙(1941年：10,805英里)的短得多。在棉花纺锭数量上，中国也只与意大利差不多。在中国行政机关控制下的电报线(1943年：59,275英里)虽然超过了意大利(1938年：41,354英里)所有的，但是还不到法国(1937年：229,000英里)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们转向非物质的设施方面，中国的中学生总数 1,163,116人(人口总数以四亿五千万计)，刚刚超过美国伊利诺斯州和纽约

州两州中学生的总和 1,077,000 (两州人口大约二千三百万)。

“无论我们怎样地看它,现代中国就它的装备和新式工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它的工业生产比起比利时还低,空军和海军力量无足挂齿,按美国人生活中的用具和设备而论,它还比不上美国中西部一个州的规模。可是这个比较微不足道的现代国家,却在一片广大而古老的地区,伸展出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的变化多端的躯体。”

在写下这些字句以后的十年中,中国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蓬勃发展成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庞然巨物。到了1958年,它的数以百万计的行政人员、党的工作者、群众组织和农业合作社的广大组织机构已经布满全国,深入到每个农村和每个家庭。报纸和无线电、旅行和交通、学习和技术、生产和消费现在都由中央以史无前例的(尽管是不完善的)效率控制着。迟钝的群众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并且从政治上使他们活跃起来,农村经济业经改组,军队有了现代化的火力,民族意识也觉醒了。政权已经渗透到传统社会之内,并且开始加以转变。

这个突然转变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中国在1948年的落后状态,正是因为中国人生活中的现代化表层极其脆薄,受到了摧残,并尚在胚胎状态之中。

1948年的前景绝不是乐观的。极权主义笼罩着全中国,它是一种先天存在的可能性,在中国像在别处一样,由于在工业时代具有成长能力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和久受压制的民族主义互相结合而成为现实的。走向工业化和实现民族主义的双生运动,久已深深印在所有中国领袖们的脑海中。赶快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使经济工业化,动员全体人民,都是凌驾一切的当务之急,这早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时代就对于任何一个爱国人士是很清楚的

事了。

我们美国人如果注意到，中国在 1948 年正缺少我们在美国不加思索而认为当然的那些现代国家的必要设备和公用事业，也许可以得到正确的看法。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我们已经有的那些东西——全国的和平与安定，不再有战事；稳定的经济，不再有通货膨胀；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不再有外国的侵略和赋予外国人的特权。我们的政治思想认为这些是理所当然的，而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以前的中国却办不到。

中国生活的改造，早在南京政府时代，和更早的西方教士和中国教育家、改革家的先驱工作中，即已有了雏型。当时曾经有过土地改革计划，使耕者有其田；有过平民识字运动，给他们以自求上进的工具；有过公共卫生措施，防治传染病和慢性病；有过提供公共汽车、铁道及轮船交通、控制水灾和饥荒的公共工程，有过造成就业和建设现代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训练。但是这一切都还有待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还有待于大量分布到几百万个农村茅舍之中。

这一点是美国人能够像中国的或俄国的共产党人一样看得清楚的。这些现代生活的种种特征，可以用美国方式来实现，即逐渐地实现，这相当费钱，还有待于许多法律程序和个人事业与社会事业等等制度上的先决条件有了一些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按照苏维埃的方式，即迅速地实现，付出轻微的资金而人们须忍受很多痛苦，以无情的强力作后盾，按照一个大胆的计划自上而下地来实现。说共产党政权的兴起是由于利用了某些现代化的潜在因素，那是就事实上说的，并不含有褒贬的意味。

至于他们利用时机做了些什么，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們战略思想中的中国 为了指导我们预测中国的行动，为⁹

了使我们看透中国的动机和反应，历史上的观察虽属舒畅，却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必要。国际秩序的脆弱组织，曾经不只一次地、完全与我们的粗疏设想相反，在远东被破坏了。

第一次大战以后，摇摇欲坠的和平结构首先于 1931 年在中国东北被破裂了。这里正是美国的外交边界曾经不幸地伸张到我们战略边界以外的地方。由于门户开放政策和 1922 年的九国公约，我们承担了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义务。可是，由于 1921—1922 年华盛顿会议上的裁军条约，我们在西太平洋把自己弄成一个军事上没有力量的国家，转而把希望寄托在集体行动上。当日本掠夺了中国东北的时候，无论是通过国际联盟的或者是在它之外的集体行动都没有发生任何效力。结果是在 1931 年以后不安的十年中，我们死抱着一个企图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远东政策，只能在纸上一再重申而事实上无能为力。没有后盾的纸上政策招致了侵略。我们由于日本的行动而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偶然的。我们自己对华政策的战略弱点，业已造成国际间的不安。从沈阳到珍珠港的整个十年中，日本人既然早已突破了我们的外交边界，那么他们会在什么地方攻击我们的军事边界，并且真的挑起我们去打仗，就是一向捉摸不定的了。

对于日本扩张主义者来说，我们对华政策的暧昧，还不是仅有的激励。日本人也由于他们自己错误地设想中国可以轻易征服而招致了失败。他们没能正确判断中国的抵抗决心。

本书 1948 年第一版内曾作出结论说：“日本和美国都遵循了贻误他们自己的对华政策。日本在华计划遭到击败，是因为他们没能正确理解和估量中国历史的实际趋势。我们今天也有造成同样错误的危险。”

不久以后，在 1950 年，我们错误地判断中国干涉朝鲜的决心。

现在，1958年，我们用武力强占了中国海岸的沿海岛屿金门、¹⁰马祖，估计北京不敢来攻击它们。

今天，我们在美国的人如果想要履行随着我们的力量而来的种种义务，我们不仅必须知道中国人在共产主义之下的情况，并且要知道他们的抱负和反应的传统方式，他们由于希望或恐惧而产生的行为类型，他们表示野心、嫉妒、自豪或者喜爱的手段，他们的幸福生活标准，他们对于国家和朋友的责任感的标准，他们对于理想和对人的忠诚标准。我们只有吃透了中国人的意图，才能够真正懂得中国事务，才能够运用智慧把我们自己同他们联系起来。

在这方面，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必须要通过历史、人文科学的门径和各种社会科学准则的门径，从各方面来衡量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中国的社会变革问题 在它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动力方面，中国问题也像一切遭受西方冲击、被西方人在国家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技术力量所压倒的亚洲社会一样。西方各国，在它们国内发生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同时，向海外扩张，因而在亚洲种下了民族意识和科学知识的种子。这个过程以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纪的扩张为开端。它由于十九世纪英国的商业帝国主义而大大前进，并且今天由于美国和俄国的援助而在加速进行着。

西方的冲击在亚洲的各个社会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日本由于它是一个与人隔绝而崇尚武力的社会，而具有特殊性质，能够抓住西方强国的原理，利用它们来防卫自己和进行扩张。缅甸、交趾支那、柬埔寨、安南、朝鲜各王国，以及马来世界的各苏丹王国都被现代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所压倒。只有暹罗由于处在英法两个互相嫉妒的范围之间而获幸免。在另一方面，中国既没有被征服，也没有奋起进行有效的自卫。一世纪以来它一直处在地狱的边